本版编辑：沈 辉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418

文化视界

乡村重建亟待文化自觉与智识嵌入

□ 柳建坤



对乡土社会的记忆和愁绪，伴随着中国文明的盛衰起伏而注入每一个中国人的灵与肉之中。纵使时空流转，依此情愫记忆，或概览贤达诗文，即可畅游天地之间，遨游往来古今。此之意境，可以说构筑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乡村社会的心灵意象。而在现代社会，对乡村的“思”或“愁”在情绪化表达的意义上，是指城市人面对都市生活压力后对历史中可能存在的理想社会形态的向往与期冀，而终其得以广为弥漫根源于城市和乡村在现代化意义上的地位演化发生巨大差异的社会事实。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城乡关系的意义上确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资源调控与分配机制。在社会资源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城市最终成为资本、人员、信息的流动高地。而乡村则在各项领域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从田园牧歌、诗情画意的古典神话退化为贫穷、落后及破败的代名词。

从现实来看，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是城乡关系失调的最显著同时也被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目前对于乡村重建的未来期许和具体规划也在推动城乡产业融合的路径中展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作为新型城乡发展关系的核心要求。以经济发展问题为核心，并且根据城乡产业结构的实际特点打造互补性优势，这无疑为破解乡村发展难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不可否认的是，激活现代经济需要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为基础，欧美国家的做法也证明了创造“资本”流入渠道以及扩展渠道宽度对于乡村建设的重要意义。然而，是否凭借“资本下乡”就能够在根本上重构乡村社会的内在动力，关于这一点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商榷。事实上，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的治理危机、环境破坏、道德衰败等内隐性问题往往受人们对乡村败落的习惯认知而长期得不到关注和解决。而且，在协调中国城乡关系的诸多策略中，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往往可以通过国家的制度投入和政策补给得到缓解。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地区在生产关系改革领先城市，生产力发展成效卓著，农村居民在此期间（1980—1985年）的收入增长速度甚至高于城市居民。但对乡村经济社会重建构成最大挑战的，乃是因乡土文化和乡村精英阶层在内外因素的作用而崩溃瓦解后，其自然性发展机理被迫中断，进而缺乏完成面向现代性全面转型的持续动力。尽管近些年其重要性得到足够重视，但由于城乡在经济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等方面的差别不断拉大，乡村精英不可阻挡地被城市抽离。乡村精英的流失，使得乡村社会“能者不治，治者不能”的尴尬局面尤为凸显，也使得本已非常脆弱的乡村治理更加失去人力和智力资源的支持。这种状况自然使得乡村治理处于一种散漫、无力的失序状态。虽然乡村重建过程中不断有资本入驻，但是现代智力资源的匮乏，导致乡村的建设改造收效甚微。

近代以降，乡村社会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激荡而起伏流变，而对其命运的关怀也贯穿了百余年的中国历史长河。在上世纪4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便对中国人的“乡土本色”进行了极为周详且深刻的透析，同时也提出了“西化”对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本土文化严重冲击的些许担忧。面对改革开放初期更加严峻的全球化趋势，费孝通主张通过“文化自觉”运动重塑中国文化根基并予以回应。文化自觉在根本上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当然，费孝通的关切并非是“文化返祖”，即排斥一切与中国传统文化意象格格不入的任何现代性事物。实践证明，一旦违背整个中国转型进程的演化规律，那么最终结果也仅仅是在现代化的外表下糊上了中国传统的“花架子”。“文化自觉”的缘起乃是民族虚无主义在狂飙突进的现代性大潮中肆意泛滥，因而其核心议题也自然指向了传统型国家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在确立文化根基重构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以及作为其重要环节的乡村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的同时，“人”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这也是乡村重建能否在实践层面得以复兴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城市化进入成熟阶段后，“资本下乡”具有强烈的主观动机以寻觅价值创造的良机。而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乡村管理机构通过改善制度环境，加大政策扶持和法规保障的力度等措施都从外力予以了有效激励，这在物质层面构筑了乡村产业转型的现实条件。但由于科学规划和市场运作机制的缺失，大量注入乡村的社会资源往往难以真正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长期以来，政府单一的行政调控体系机制对于深入推进乡村建设规划迅速落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崛起的背景下也极大地影响了规划决议的最终效果，致使优良的资源环境常常遭受到严重破坏。在新一轮的乡村建设中，乡村规划从设计到实施必须以智力资源的嵌入为前提，也就是引导精英群体进入乡村，参与乡村重建，他们所提供的智力资源才能保证乡村规划的科学性，为乡村重建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同时，文化精英的嵌入必须保证与乡村资源契合的精准性。一方面，地方政府在组织进行乡村发展规划论证以及制定工作时，所邀请的专家学者必须是与该领域密切相关的人士；另一方面，乡村也要通过自身文化再生产活动，创造出吸引城市文化精英的文化资本吸力，以精英群体的文化实践推进乡村文化的启蒙与觉醒，增强传统文化资源与社会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共契与融合。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远景必须是以乡村经济现代化和社会文明化为根本指向，而关键在于是围绕“资本—知识—权力”建构动力机制。在实践中，则必须以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为物质基础，并依靠文化自觉运动塑造新时期的乡村文化根基以及通过智力资源的精准嵌入，以提升乡村社会文化再生产的能力。这也是推进城乡协调互补发展并建构通往“美丽乡村”和“中国梦”宏伟愿景的有效路径。

如北辰灿然居中

□ 李文文

当人生有了理想与追求，并为此而执守，生命的意义便富有了质感。它充实于内，广大光辉于外。需要知行合一；需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做人，要做事，这就是广义的“为政”了。然而，为了更加高效的“为政”，还可以再聚焦，再具体。聚光灯将会敏锐地映照于社会的决策系统，管理系统，可以名曰“政治”。当然还可以再聚焦，再具体，就是“为政者”。这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如何为政？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为政以德的本质是领导干部本人要有德，以美德来教化人，吸引人，实现政治的目的。进而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如同北辰灿然居中，群星环绕。然而，这样的期望是不是多有理想主义的成分，讲起来主动，行动起来被动，结果落入虚无，成为束之高阁的“大道理”？这是真正的为政之大道，还是孔子一厢情愿的“人文幻想”，幻想出一个“乌托邦”。这其中的道理值得深思，是什么使得孔子讲出了这样的“大道理”，需要向源头处追溯。

《皋陶谟》是《尚书·虞夏书》中的一篇，全篇字数不及两千，但内涵丰富，意义精微，记载着舜与大禹、皋陶的讨论谈话，涉及修身养德、顺天应人等许多治国安民的根本道理，人们解读《皋陶谟》，很自然发现该篇与儒家主张之间的联系，并将皋陶的思想看作儒学的源头。孔子论《皋陶谟》，一曰可以观治，一曰可以观政，意思完全一致，均是孔子心中的理想政治。读《帝典》，孔子说他见“尧舜之圣焉”，于《皋陶谟》，孔子认为他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勋焉”，这就是孔子心中为政者的形象。君王圣明、仁爱，臣属忠勤功勋。

这一切都有一个最为基本的起点，就是为政者个人的修养，从修德、修身开始，诚敬地遵行，而且要不懈地坚持下去。在早期儒家的视野中，“人”处在最为根本的位置，是最受关注的对象，是社会最基本的构成要素。解决了人的问题，也就解决了社会的根本问题。

当位而行，北辰居中不动，群星环绕。这其中还有一个很深的寓意，纵然是斗转星移，时光变迁，美德的要求将如如不动，将是永恒。这样看，孔子之所以坚定，就是因为那至善至美的政治，实在不是一厢情愿的“人文幻想”，那是曾经的现实，也是充满希望的未来。

经典今读

教育视野

让新的生产力引擎成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

□ 赵 刚

目前，伴随着技术交易市场日渐成熟，以及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的加快，我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瓶颈主要集中在高校。高校融教育和科研两大功能于一体，既是培育创新型人才的摇篮，也是催生重大科技成果的源泉。看一个高校培育的学生是不是人才，必须让其到社会上经受大浪淘沙，看能否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同样，看一个高校研发的科技成果是不是有价值，也必须使其进入社会生产，看能否提高社会生产力。

作为高校的两大产出，学生终有一天要走出“象牙塔”，去接受社会大熔炉的挑战；而科技成果，之前由于受到体制机制的束缚，并没有主动接受社会生产的检验，大部分被“束之高阁”，转移转化的比例很低，造成国家投入的大笔科研经费付之流水，没有产生实际应有的社会价值。如何让高校科技成果走出“象牙塔”，在社会生产中发挥其用武之地，既是新常态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由之路，也是建设世界一流高校的内在要求。

因此，继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制定《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之后，教育部、科技部又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若干意见》，目的就是缓解乃至消除这一瓶颈，真正打通教育、科研与产业之间的桥梁，使高校成为新的生产力引擎，释放出这一强大科研力量的潜力，并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

要让高校科技成果成为新的生产力引擎，首先在科研立项时就要瞄准和重视项目的应用前景，避免为了科研而科研，在立项之初就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界定清楚各方的权益，帮助整个团队把握和引导科研方向，更好地满足项目商业化、产业化的需求，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铺好道路。

要让高校科技成果成为新的生产力引擎，最重要的是增强高校科研力量的研发动力，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充分考虑高校科研工作者的切身利益，尤其是青年教师、研究生的利益，要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客观评估他们在知识产权产出中做出的贡献，使其享有相应的权益，减少他们面临的经济压力，为他们创新创业提供更多机会。

要让高校科技成果成为新的生产力引擎，还需要简政放权，尽量减少行政干预，真正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形成良性互动的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协同创新机制，让企业从高校科技成果中成功掘金，为企业带来效益，为高校科研工作者带来丰厚的报酬，为高校带来声望和影响力，最终提高国家的整体创新能力。

总之，对任何一所高校而言，科技创新本身并不是目的，将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才是目的，这就要求高校主动破除“围墙”，积极融入社会，与企业接轨，与产业搭界，创造出可转移转化、真正有价值的成果，释放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潜力，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看孔子怎样说话

说话是门系统和综合性艺术，话语传达了一个人的态度、情感、智识和观念。既然言行如此之重要，那圣人孔子如何具体看待和传达言行？孔子将言行的重要性比喻成个人的枢机。枢机一发，主宰荣辱，可以惊天动地，不可不慎重。

□ 马正立

说话为何重要？孔子将言行的重要性比喻成个人的枢机。枢机一发，主宰荣辱，可以惊天动地，不可不慎重。“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2500多年前的孔子似乎远见了言行达至千里之外的影响力：“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

既然言行如此之重要，那圣人孔子如何具体看待和传达言行？《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集，凝练着孔子的思想和智慧。不妨从《论语》中找找孔子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

其一，说话为什么难？孔子认为要践行诺言很难，因此说话宁可慢点来，“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如果一个人大言不惭，信口开河，那么他也难以履行，“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另外，话一旦说出后，即使后悔也很难再收回来，孔子弟子子贡认为“驷不及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正是鉴于说话如此之难，孔子一度都几乎不想说话，孔子认为天什么都没说，四时照样运行，百物依然生长。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其二，怎样选择说话取向？孔子不谈论怪异、勇力、乱象、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语常而不语怪，讲的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常理。孔子语德而不语力，不推崇单纯“暴虎冯河”的勇力，甚至认为“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孔子语治而不语乱，探讨的都是如何治理好国家的道理，而不是祸乱国家之说。孔子语人而不语神，孔子的道在人间，鬼神不是孔子关注的对象。

其三，一般什么不说？孔子很少主动谈到功利、命运和仁，“子罕言利、命与仁”。孔子将义放在利前面，主张“见得思义”，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于富贵要得之以道，对于贫贱要去之以道，“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很少说大话和空话。在“体用”关系上，孔子更多探讨的是经学致用，而很少去空谈作为“体”层面的大道理“命”和“仁”。作为“体”的“仁”有很多形式的“用”，比如孔子在回答弟子们询问而提到的“克己复礼为仁”和“仁者其言也讱”。在知和行关系之间，孔子更强调行和恒，“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且在孔子看来，“仁”也并不是高深而不可及。孔子认为“仁”就在身边，能拿自己打比方，推己及人，为人着想就是为“仁”的方法，“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其四，说话遵循什么原则？一慎言。孔子弟子子贡认为，一句话就能表现出一个人是高明还是无知，说话不能不慎重，“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二择人择言。孔子认为对于应该珍惜的人才，若不注重与他们交流，就容易流失人才。反之，不该说的话忍不住说了，就是言语过失，“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另外，还要根据说话对象来变通说话方式，“大道理”和“通俗话”要依照听众来择取，以达到对话双方更理想的沟通和理解效果，“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三责己宽人。孔子认为重责备自己，轻责备他人，就会远离怨恨，“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其五，以什么方式说话？孔子不悬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不唯我独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这点看，孔子的言行方式注重严谨求实、留有余地、开明革新、平等包容。若不这样，孔子认为强嘴利舌的言行会经常招致他人的憎恨，“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孔子主张言论要忠实可靠，行为要笃实恭敬，这样即使在异邦他国也能行得通，“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孔子认为说和做之前要多听和多看，有疑虑拿不准的地方先保留起来，其余拿得准的部分则慎重地说出来和做下去，这样才能减少错误和后悔，“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

其六，说话忌讳什么？一忌巧言令色。孔子认为花言巧语、伪善的容貌和十足的恭顺是可耻的行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二忌无端抱怨。孔子认为不怨天尤人是美德，“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同时孔子认为他自己能达到学而知之，也得益于从不抱怨，积极治学，“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三忌言过于行。在孔子看来，说得多，做得少，言过其实是可耻的，“君子耻其言过其行”。孔子认为应把做事放在说话之前，“先行其事而后其言”。做事要敏捷，说话却要慎重，“敏于事而慎于言”。四忌说话太多。孔子弟子子游认为对他人说话过于烦琐，则反而会招致侮辱和疏远，“事君数，斯辱也；朋友数，斯疏也”。对待朋友要忠心地劝告，实在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就不要自找侮辱，“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五忌躁、隐和盲。孔子认为说话要等待时序，轮到自己该说就要表达出来，说话时要觉察特定环境情形，“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其七，怎样辨别他人说的话？一察之有道。孔子认为大家都说一个人好或都说一个人不好，那么自己要坚持独立考察，“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如果自己无法考察，怎么办？满乡村的人都喜欢他，就判定他是好人吗？或者满乡村的人都讨厌他，就判定他是坏人吗？孔子认为以上两样都不能作为判断依据，最好是满乡村的好人都喜欢他，满乡村的坏人都厌恶他，“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二观之以行。孔子认为要结合对方的行为来验证他说的话，“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三远谗辨诬。孔子认为细雨润物和日积月累的谗言，肌肤所受和急迫近身的诬告，是有害且难以察觉到的，要随时谨慎提防，保持清醒明白，“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

综上所述，自古至今说话是门系统和综合性艺术，话语传达了一个人的态度、情感、智识和观念。注重技巧上的把握是治标之举。处处践行“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才是治本之策，庄重就可免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众心，诚实就会得到信任，敏捷就会有功效，慈惠就能得到他人支持，“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